

朱子学文库



1

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

DONG YA ZHU ZI XUE
DE XIN SHI YE

朱人求 〔日〕井上厚史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朱子学文库



1

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

DONG YA ZHU ZI XUE
DE XIN SHI YE

朱人求 [日]井上厚史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汉、日/朱人求,(日)井上厚
史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朱子学文库)
ISBN 978-7-100-10736-5

I.①东… II.①朱…②井… III.①朱熹(1130~
1200)—理学—国际学术会议—文集—汉、日 IV.
①B244.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78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

朱人求 〔日〕井上厚史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736-5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张 27½

定价:58.00 元

朱子学的精神与未来

——《朱子学文库》序

陈 来

在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如果说孔子是上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那么，宋代的朱子就可以说是近古文化集大成的代表。朱子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大学者，后人称其学术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南宋以后，朱子和他的思想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社会文化影响甚大。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朱子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 700 多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的统治哲学。不仅如此，《朱子小学》、《增损吕氏乡约》、《朱子家礼》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礼仪也日益成为东亚民众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朱子学因之成为近世东亚文化的共同信仰。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学仍然焕发着生机和活力，《朱子家礼》在韩国、在中国闽台地区仍然发挥着它的部分功能，韩国和中国每年都会举行朱子祭礼来缅怀朱子的丰功伟绩，朱子学仍然存活在我们身边，仍然是我们重建精神世界的活水源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意义？换言之，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未来精神世界的建构？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意义。

1. 文化传承

朱子的文化实践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朱子对

古代文化做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与诠释尤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朱子在孔子以后的文化传承方面做出的贡献，是近一千年以来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发展而来的，中华民族今天的成就是以发展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而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以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文化传承，不仅具有延续民族文化的意义，更具有满足当今重建社会价值的意义。应当学习朱子在文化传承方面的抱负和努力。

2. 主敬伦理

朱子学的学问宗旨，常常被概括为“主敬穷理”，所谓“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主敬”是一种内心的状态，也是一种行为的状态，是“教人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从广义的内心生活态度来讲，敬畏感是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内心态度和感受，其根本必归结到康德所说的对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的敬畏。头上的星空代表宇宙法则，宇宙法则加上心中的道德，这就是朱子讲的天理。主敬包含的敬畏感，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心灵境界和道德境界。从做事的角度来说，朱子学的现代意义之一，是可以为东亚社会提供一种“工作伦理”，朱子学的“主敬”精神为传统到现代的工作伦理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资源、现成的伦理概念。

3. 学习精神

朱子学最为强调的是格物穷理，大学的“格物”朱子解释为即物穷理，格物穷理之方法是多种的，朱子特别强调的是读书讲学，其中特别突出学习的精神。就哲学的精神来看，朱子学可以说是孔子学习思想最大的继承、发展、推动者。朱子学的格物论可以说是对儒家自古以来的“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的论证和展开。今天的现代社会在教育程度上已与古代不同，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属“大学”，所以朱子学几乎适用于今天现代社会的所有人。现代社会越来越是一个“学习型社会”，朱子学的“学习精神”应当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指导。

4. 教育理念

除了学习精神，朱子学的教育理念也有其现代意义。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角度来看朱子的格致论，朱子所强调的格物和问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肯定经典讲论在儒学中的正当地位。朱子对经典的学习非常重视，朱子所推动的读书主要也是读圣贤之书，读经典之书。朱子学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于晚近受到大家重视的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因为朱子的格物说的确不是朝向某些专业的科学研究，而是重在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宽阔胸怀。这些思想都是与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相通的文化资源。

5. 实践哲学

朱子不仅强调知识的学习，而且更为强调实践，这种对实践的强调，特别体现在朱子一贯提倡的“知行相须”、“力行为重”上。照朱子的讲法，致知与力行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但论先后，知在先，行在后。论轻重，力行为重。知而不行，就不是真知，真知一定能付诸于实践、表现于实践的。这种精神合乎 19 世纪以来实践哲学的发展，当代哲学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和关怀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朱子学的精神和近代哲学是相通的。

6. 化民成俗

朱子的儒学思想固然着眼于成年读书人的修身，但也关注社会风俗的改善。他强调大学之教不仅与“学者修己治人”有关，也与“国家化民成俗”有关。所以，其论教育的结果，“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学习者经过学习，不会脱离人伦日用，而能够更加理解自己的天性和职分，在其本职位上尽伦尽职、尽力尽心。每个人都在其社会职位上尽其力，国家自然就可得化民成俗之效。朱子是对传统蒙学教育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著作如《蒙童须知》、《小学》、《增损吕氏乡约》以及《家礼》等，在社会上流行甚广，对儒学价值的大众化、通俗化，对培养少年儿童养成德性，对形成文明的社会礼俗，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天应当重视

朱子这方面的贡献，使朱子的这些著作与目前流行的《弟子规》一起，古为今用，在道德教育中起其应有的作用。

近百年来，我国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有过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 21 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开拓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如朱子的易学、朱子的四书学、朱子的工夫论、朱子的经学、朱子的经典诠释、朱子的文学、朱子的自然学、朱子后学的研究、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朱子礼学的当代社会实践研究等，都出现了不少专书、论文，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种研究的多元化和广泛性在宋明理学其他大思想家的研究中（如陆象山、王阳明）是很少见的。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对朱子学的研究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的整体，我们今天仅仅是对于朱熹本人的研究，也不能说是很充分的。如何发展朱子哲学研究的理论思维，提高理论地把握和处理朱子学材料的水平，关注较大范围的哲学思考，仍是朱子学研究应当持守的层面。在朱子后学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一些发展，只是总体上相比阳明后学的研究，还很不够。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时代）的朱子后学的重要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如果完成这些工作的话，对于学科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建树。我们应当在不长的时间内使朱子后学的研究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进一步说，朱子后学，若只限于一传二传乃至三传的意义上，还不能穷尽“朱子学”的范围；从更广的朱子学的角度看，元明清的朱子学家思想群体都应有规划地一步步地开展其研究，成为体系，使“朱子学”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历史得以呈现，使“朱子学”的研究更加丰满。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 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中国朱子

学研究多停留在第一层次，今后我们要大力提倡和发展第二、第三层次的朱子学研究。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大致相同的，哪些是与宋明儒学的批评不同而反映了日本思想的特色。反过来，只研究朱子的思想，而不研究李退溪、李栗谷、伊藤仁斋的思想，就不能了解朱子哲学体系所包含的全部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不能了解朱子思想体系之被挑战的所有可能性，以及朱子学的多元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朱子哲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换言之，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相互促进，构成了东亚朱子学承传与创新的独特的风景。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真空，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

反观近世东亚的朱子学（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的朱子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也有不少研究，后来因学科目录中原有的“东方哲学”不再存在，使得相关研究的发展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应继续努力加强其研究。近十年来中国台湾学者尤其是新儒家学者对韩国朱子学加强了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这一领域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台湾朱子学界近年普遍出现了对牟宗三先生朱子研究范式的一些反省和讨论，也促进了朱子哲学研究在台湾地区的新的开展，并将推动整个朱子哲学研究的深化。

最近，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朱子学会积极吸纳全球朱子学专家和学者的最新成果，拟用5年时间出版30册左右的大型《朱子学文库》，这是继20世纪日本发行《朱子学大系》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朱子学著作的大结集，文库的作者群来自全球各地，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内容也以东亚朱子学研究和全球百年朱子学研究为主，我认为，这将是21世纪朱子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老一辈邹永贤教授、

高令印教授、何乃川教授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拓创新，为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邹永贤教授主编了《朱子学研究》、《朱子学论丛》，在学术界影响颇佳。高令印教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朱子学研究，其著作《福建朱子学》、《朱子学通论》等在朱子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其作品《退溪学与东方文化》、《朱熹事迹考》被翻译成韩文，为韩国朱子研究者所重视。2006 年，厦门大学国学院复办，复办后的国学研究院，在国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组织校内外相关科研队伍，在开展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推动朱子学、海峡两岸国学研究与互动交流方面，成绩突出。近 5 年来，先后举办（包括联合举办）规模较大的国际和海峡两岸朱子学研讨会 6 次，出版朱子学研究专著、译著 10 余部。2011 年 9 月，朱子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创办《朱子学年鉴》，组织举办多次大型国际朱子学会议，团结了一大批海内外朱子学研究专家，引领朱子学研究走向国际化，厦门大学朱子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阶段。2012 年和 2013 年，厦门大学分别获得《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两项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并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朱子学文库》，它也标志着厦门大学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朱子学研究的中心。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未来的路很长很长，我们坚信，发展朱子学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要加强规划，抓紧开展，促进国际交流，利用目前重视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使朱子学的研究开出一个新的局面。

是为序。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序

朱人求

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东亚朱子学的新视野》一书，由朱人求、井上厚史主编，系2013年1月26—28日在日本爱媛大学召开的“韩国儒学之位相”国际学术研讨论文集，中日文版，共收录《从比较视域看韩国儒学研究——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中国台湾李明辉）、《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中国朱人求）、《退溪学在朱子学中的文化价值》（中国高令印）、《论李退溪敬说之特征——从朱子后学敬说系谱谈起》（日本井上厚史）、《近世日本的儒礼实践》（中国台湾田世民）、《伊藤仁斋的“天下公共之道”与“民”之政治觉醒》（韩国高熙卓）、《近世日本“敬”说的容受与展开——以中江藤树、山崎暗斋为中心》（日本板东洋介）等9篇韩国、中国、日本朱子学研究论文，集中展示了中日韩学者有关东亚朱子学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视野。

朱子学是中国乃至东亚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作为一代宗师，朱子又以其真知睿见和“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恢宏格局而成为“蓄水池”式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统治了南宋以后元、明、清700余年的中国，而且影响到整个东亚世界，并演化为东亚世界共有的统治哲学。换句话说，早在700多年前，朱子思想就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当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概而言之，朱子思想本来就不只是“中国的朱子学”，对相关

议题的讨论若以“东亚的朱子学”甚至“世界的朱子学”为立场，可能才更符合文化实际，更有利于激发学术发展的潜能。

一 东亚朱子学的界定

朱子学，顾名思义，就是指朱子的学说，这是狭义的朱子学概念。最早的朱子学指闽学，就是朱子之学。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它指朱子及其后学的学说。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当然包括朱子及其在东亚的后学的学说。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

在《朱子学与近代日本的形成》一文中，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认为，朱子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指朱子本人的学问，广义则是指所有师承朱子学的后继者所发展出来的学问。日本朱子学属于后者。若按狭义来理解“东亚朱子学”，则意指探讨与原始“朱子学”之间的距离。此类议论可以区分为“真实与虚伪”、“主流与旁支”以及“正解与误解”等两层构造。辨别真伪的议论是以“真正的朱子学”是否存在为前提，然而所谓“真正的朱子学”是隐含在研究者解释后所重构出来的意义中，也就是必须取决于研究者的正统意识、本源意识后，才得以显现。有意思的是，子安宣邦称呼朱子后学所继承的朱子学为“朱子主义”，如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朱子本人的学问与后学所发展出的朱子主义之间，有必要做出区分。这样的区分，能够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日本的朱子学，也就是朱子主义式的学问和思想。

韩国西江大学郑仁在教授将朱子学传入韩国后的发展情况，区分为“本源朱子学”（比较符合朱子的学问）和“修正朱子学”（与朱子学说有一定差异的学问）。罗整庵是“修正朱子学”的鼻祖，李栗谷深受

罗整庵的影响，属于修正派。李退溪反对罗整庵，属于本源派。郑仁在理解的朱子学，是指朱子之前的北宋五子之学、朱子本身思想，及其在中国、韩国、日本、欧、美的发展与修正。这是一种广义的朱子学概念。

东亚朱子学是东亚儒学相关论述与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指出，近七百年来东亚各地儒者可以阐释朱子，可以批判朱子，但不能绕开朱子。从东亚儒学的发展来看，朱子（晦庵，1130—1200）之学涵盖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相关的儒学拓展、传承与研究呈现出两个层次的特质：第一个层次是儒学由中国经由韩国向日本的传播过程中，有着共同关切的典籍（例如《论语》、《孟子》）与议题（例如“五十而知天命”、“四端七情”、“民贵君轻”等），而对议题的发挥程度与内容则彼此不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价值理念在“同心圆”式的逐层展开时，呈现出相当的类似性；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国朱子学思想内容在类似性中展现其殊异性，也是“理一分殊”之具体而微的表现。但是经典与议题的同源性和类似性，不能强制规范各区域的分殊表现，因而这里便涉及第二层次的“去中心化”现象。就各区域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以及民族或政治之自觉而言，日韩儒者极不愿将中国儒学视为其唯一中心，而中国儒者也不能一厢情愿地将日韩儒学看作其附庸或边陲。“中心一边陲”的论述很难解释这类文化与思想的发展轨迹，即以希腊和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为例，西欧与美洲大陆日后的发展，已取代这两种文明起源地的重要位置而成为新中心；而佛教在东亚与南亚的特殊发展，亦早与印度佛教分道扬镳，并在后者衰亡之后成为新的思想与信仰的重镇。实质上，这种“去中心化”的背后就是“去中国化”，这一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正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C. Geertz）曾经呼吁，我们要研究那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而朱子学正是这种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认为，朱子学有三个层次，犹如一个同

心圆展开的过程。第一个层次，中国文化圈中的朱子学；第二个层次，东亚文明圈中的朱子学；第三个层次，全球朱子学。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属于第二个层次的朱子学，其问题意识来源于本源的朱子学，也必然包含本源的朱子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正确立场是“中国本位，东亚视点”，或者“中国本源，东亚视点”，注重东亚朱子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区分东亚朱子学的不同表现形态。东亚朱子学是“一体多元”的朱子学，“一体”指朱子学说本身，“多元”指朱子学在东亚的不同的发展形态。

二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提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早在七百多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的一体化进程，当时的朱子已经走向了世界。近年来，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研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东亚朱子学研究者逐渐正视中日韩和欧美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将自身定位在“国际朱子学”的脉络之内，密切关注同领域的研究动态，对相关学术资讯的把握相当及时而准确。如何面对海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中国大陆朱子学界整体直面的重要课题。“面对”即意味着吸收与批判，而日本、韩国学者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长期积累与贡献，更是不容忽视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意义深远。

第一，组织策划东亚朱子学研究是朱子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系统而全面地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整体研究，比较中日韩朱子学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的异与同，总结出其中的方法论和规律，提炼出新的理论模型，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是朱子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于进一步推动朱子学的合作与交流、研究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近百年来，东亚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起落消长，虽然也有过种种曲折，但总体上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 30 年来，朱子学研究异彩纷呈，取得了大量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东亚朱子学学术成果、方法论及其理论模型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清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因而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其发展趋势，为未来朱子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二，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发展。

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其原因之一在于宋代儒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理学。朱子集理学之大成而有朱子学，所以，朱子学与儒学以及宋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宋末之后，儒学实际上是朱子所诠释的儒学，文化是朱子学影响下的文化。然而，近百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朱子学受到了太多的误解和批评。这对于儒学的研究，乃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极为不利的。在全球化时代，系统而全面地展开东亚朱子学研究，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促进中日韩朱子学的对话与交融，不仅对于朱子学的研究，而且对于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进行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以及东亚各国的学术文化交流，对那些企图“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东亚儒学研究起到纠偏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东亚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重大。

海峡两岸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同属一个中国，朱子学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朱子文化在明清之际传入台湾地区，成为台湾地区的统治意识形态，对台湾地区影响至深。至今，台湾地区许多书院仍主要供奉朱子而非孔子，朱子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海峡两岸以及国际有关朱子学的学术交流尤为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海峡

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了东亚朱子学和儒学研究的发展。

在肯定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台湾地区东亚儒学（东亚朱子学是其中应有之义）的“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倾向让我们倍感忧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约翰（John Makeham）教授指出近年来台湾地区兴起的东亚研究，乃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应对“去中国化”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这个分析虽是外缘性的，但作为第三者的一种审视观点，值得引起重视。日本子安宣邦的忧虑也有此意，台湾关于“东亚儒学”的提出是否想取代中国大陆成为新的“文化帝国”的中心呢？回答是肯定的。台湾大学“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的执行人黄俊杰旗帜鲜明地指出，“东亚儒学”这个新领域本身就已经蕴含着多元论的观点。“东亚儒学”新领域之开拓，一方面超越旧“汉学”之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挣脱“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研究格局，实现去“中国中心论”的目的。简言之，“东亚儒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走向“台湾本土化”，以“边缘”取代“中心”，以达到“去中国化”、“去中心化”的目的，这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我们认为，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坚持“中国本位，世界眼光”，对这一错误的文化倾向起到积极的纠偏作用，回归本源，以正视听。我们坚信，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之研究的东亚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反过来对于深入了解东亚的历史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东亚和近代以来东亚的社会、政治、文化，东亚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第四，大力推进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东亚文化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长期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而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系统而全面地总结东亚朱子学的核心话语、具体实践及其内在规律，就是要立足于把朱子学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学术研究，弘扬中华文化，在通过

对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中推动中华文化的承传与创新，推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东亚朱子学是一门国际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在历史上曾经一度成为中日韩国家的最高统治哲学，影响东亚世界数百年之久。朱子学是能够在东亚地区造成广泛文化认同的普世的东亚价值源泉，对东亚朱子学进行系统研究，可以提升东亚地区文化软实力，可能建构一种能得到中日韩普遍认同的东亚思想系统，有利于提高东亚各国的文化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促进东亚文化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

第五，深入探讨东亚朱子学研究，有利于促进“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促进全球文明对话和人类未来精神的建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东亚朱子学是东亚文化所依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东亚历史上曾得到东亚国家的集体认同，东亚朱子学研究对于在多元文化论的前提下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无疑是一项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思想文化积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积极参与人类精神的重构，朱子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活水源头。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每一种民族文化只有积极参与全球对话、自觉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获得全球文化的主导权。正是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朱子学研究置于“文明对话”的视野，对中日韩朱子学的经典文本、话语与实践展开深入具体的研究，进而为朱子学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同时也能使朱子学为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总之，全球化背景下的朱子学研究理应成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形态，而自觉的朱子学研究源于我们对朱子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切，尤其是对时代问题、对当下现实的深切思考。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畅想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我们满怀信心、同心协力、奋发图强。

三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在汉语学界，我们对东亚朱子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仍缺乏系统性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东亚朱子学的“东亚”应该是整体的东亚和文化的东亚。以往东亚朱子学研究多以点为主，有较多的单篇论文和少部分论文集，对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还不够。中日韩朱子学承传与创新及各自的特色，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东亚朱子学的共同价值，东亚朱子学的问题意识，东亚朱子学的人文精神，东亚朱子学的接收模式和类型，东亚朱子学的一体与多元，走向“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东亚文化的相互交涉，文明对话中的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未来，朱子学与全球化，朱子学的当代实践，朱子学如何走向世界等都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未来的东亚朱子学研究应填补空白，走向综合，从整体上揭示和阐释东亚朱子学的话语体系，揭示出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思想脉络和朱子学的相互交涉，并予以其思想以正确的理论定位。只有在全球化的境遇中，这一研究才能得以充分展开并成为现实。

第二，中、日、韩东亚朱子学的相互交涉。朱子的思想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并在此后元明清各时期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成为近世儒学发展的主流。朱子学自13世纪起开始向世界广泛传播，在日本、韩国的历史上曾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很高的水平，成为东亚近世文明共有的思想形态。在上一个千年期，朱子无疑是一位有着世界影响的杰出人物。陈来先生指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核心的“新儒学是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不全面了解朱子学的各个方面，就无法了解东亚朱子学者对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只有全面了解中国宋元明清儒学内部对朱子哲学的各种批评，才能真正了解德川时代儒学对朱子的批评中，哪些是与中国宋明儒学的批评大致相同的，哪些是与宋明儒